

季羨林

原始佛教的
语言问题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季羨林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温 颖

封面设计：冯式一

责任校对：王应来

版式设计：李 勤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YUANSHI FOJIAO DE YUYAN WENTI

季羨林 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78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2000册

统一书号：9190·042 定价：1.10元

目 录

自序.....	1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7
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16
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41
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	86

自序

我开始研究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是在四十多年以前。当时我是德国格廷根大学的一名候补博士生。我的老师 Prof. Dr. Waldschmidt 给我出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大事〉 (Mahāvastu) 颂中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用所谓佛教梵语 (Buddhist Sanskrit) 或混合梵语 (Hybrid Sanskrit) 写成的。在研究佛教的学者中，这种梵语算是一门不冷不热的学科。有一些人在研究，但人数不多，英雄大有用武之地。我的老师之所以给我出这样一个题，其用意大概也就在这里。他问我同意不同意这个题目。我是一个初学者，门还没有进，更谈不上登堂入室，除了答应之外，也确实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我同意之后，接着来的是长达三年的看书、搜集资料 and 进行写作的时期，这是一段只争朝夕的艰苦奋斗的时期。

在这三年内，我从对佛教梵语毫无所知，经过了渐有所知的阶段，在这方面的知识终于多了起来。我对佛教梵语的兴趣也逐渐浓厚起来。因此，在 1941 年我考试完毕后被迫留在德国的四年内，在机声嗡嗡、饥肠辘辘中，又接连写了三篇有关佛教梵语的论文。这些论文现在都收在《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出版)。这算是我研究佛教梵语的第一次高潮。

1946 年回国以后，我既缺少应有的专著，又缺少必备的杂志，赤手空拳，一无所有，不管我的兴趣还是多么浓厚，我的研究劲头还是多么大，却只好被迫搁笔。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无法进行了。我当时有一句自我安慰的话：“有多大碗，吃多少饭。”实际上，在佛教梵语方面，我根本就没有碗，更谈不上碗的大小，我

只好用别的碗吃其他的饭了。

1956年，我写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它丝毫也不能证明，我此时已经有了足够的书籍，掌握了大量的资料；事实正相反，从1946年起到1956年这十年之内，我闭塞如故，与世隔绝，已经下定了决心，对佛教梵语的研究洗手不干了。1955年，我到民主德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曾有机会看到一些有关佛教梵语的著作，然而我漠然置之，无动于衷，我的心情由此可见一斑了。为什么事隔一年又写了这样一篇论文呢？原因是，当我浏览几篇国内外学者关于印度佛教史的文章时，忽然心血来潮，灵机一动，觉得可以利用他们使用过的材料，来解决一个他们没有想到的问题。我想解决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材料不是新材料，问题不是新问题。可是把这些材料同这个问题联系在一起，我却是第一人。如果说这篇论文有什么价值的话，其价值就在这里。这篇论文我曾在1959年缅甸研究会（等于科学院）的大会上宣读过，英译文就发表在会刊上。这一篇论文既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成的，其局限性，包括引用书籍在内，是显而易见的。

1958年，我写了《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也同样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位研究印度语言的朋友告诉我，美国著名的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 Edgerton）教授在他的大著《混合梵语语法》中提到了我用德文写成的那几篇论文，并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连忙把他那皇皇巨著连同《混合梵语词典》借了出来，仔细阅读一遍。一方面我对爱哲顿教授的成绩感到钦佩；另一方面对于他的看法感到问题很多。于是情不由己地写了那篇《再论》。里面的例子几乎全是我在德国使用过的旧例子，新的很少。但是行文的口气则颇为尖刻。讨论学术问题，本来应该心平气和，以理服人，坦荡直率，与人为善，行文不要带刺，说话不要伤人。可是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回想起来，其中最主要的是与我

当时对美国的态度有关。美国当权者对我国推行敌视仇恨的政策，我们对他们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感，这是全国人民共有的感情，我当然不会是例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在讨论学术的论文中，我这种感情竟自然流露地发泄到爱哲顿教授身上来了。这是不幸的，但是可以理解的。

此后，是一段长达二十几年的漫长的沉默时期。我吃饭的碗数目越来越多，一不愁碗，二不愁饭，我几乎想不到佛教梵语了。

1980年，我应邀访问了联邦德国，在我曾住过十年的格廷根城住了三天。这一座小城的城内，同我将近四十年前离开时，几乎完全一模一样，一点也没有改变。我一下子就能找到我以前曾千百遍踏过的铺在地上的石头和石阶。我恍惚感觉到，自己昨天才离开这里，仅仅过了一夜，现在又回来了。今昔之感，油然而生。最让我高兴的是，我又见到了已经八十五岁高龄的老师 Waldschmidt 教授和他那比他还大一岁的夫人，二老仍然健壮如昔。他们住在一座豪华的养老院里，看来物质生活方面什么也不缺少；但是此地实际上是一个死亡等待所。二老孤单苦凄，我心中无端凄凉起来，偷偷地抹掉了眼中流出的泪水。我的老师的接班人就是我在论文中屡次提到的 Prof. Dr. H. Bechert。我们是初次会面，但他盛情招待，亲自驾车陪我参观，临别时又送了我不少新出版的书，其中包括几册原始佛教语言座谈会的论文集。他还聘请我担任了《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文词典》的顾问。我把那些书都带了回来；但是怎样利用这些书，我最初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仍然有点漠然置之，无动于衷。

回国以后，看到那些印刷精美的书籍，有时忍不住技痒，随意翻看几页。我在上面讲到，我对佛教梵语已经决心洗手不干。现在我才知道，那只是一个假象。在我的灵魂深处，我对佛教梵语并没有真正忘情，还有一棵还没有意识到的爱惜佛教梵语的幼芽在，一旦气候适合，这棵幼芽就会萌动。现在读到了召开原始佛教

语言座谈会的记录，研究了座谈会上宣读的论文，我心中的那一棵幼芽真地萌动起来，大有要开花、结果之势了。

最近三年以来，我到外地开过许多会：到过西安，到过桂林，到过合肥，到过兰州。每一次出去，我随身携带的书中总有关于佛教梵语的论文集。每天凌晨，不论是面对着窗外的桂林山影，还是听到合肥稻香楼树丛中画眉的鸣声，或者听到西安丈八沟丛篁中的窸窣声，摆在我眼前桌子上，我潜心默读的总是这一部论文集。我就这样断断续续而又锲而不舍地读了三年。开头时，我对书中的一些论文颇感到有点新鲜。但是越读越觉得其中有些意见极为偏颇，觉得好象是有意标新立异。我随时把书中的意见和我自己的看法都做了详细的笔记。就是在这时候，我还没有写什么东西的想法。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有如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终于拿起笔来，写了间断了二十四年以后的第一篇讨论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的论文《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临时又补写了两篇论文，把我那未竟之意都收在里面，名之为《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这可以算是第二次高潮吧！

从笔调上来看，这几篇论文尖刻的程度似乎还要超过《二论》。《二论》尖刻的原因，我上面已经谈过了。这一篇《三论》情况完全不同，为什么还这样尖刻呢？说句老实话，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只是信笔所之，自然流露，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这里根本没有起作用。但是，世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原因或者根源。我这样做的根源何在呢？仔细分析起来，约有以下诸端：首先是，学术讨论要有充分的论据。但是，座谈会上的一些意见，论据是不够充分的。至于 Bechert 教授反对我的意见的那些意见，更是轻率到令人吃惊的地步。比如 $-am > -o$, $-u$ 的问题就是如此。在他举出的书中第一行第一个字就是这样的语法现象，但是他却偏偏说根本没有，这真难免令人啼笑皆非。其次，他在文章中使用的调子也过于轻率。这些我在文章中都已谈到，这里不再重复。最

后，我总觉得，Bechert 教授等一些学者好象是有意标新立异。有此诸端，蕴积心中，发而为文，笔调在不知不觉中就尖刻起来。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是非常困难的。我扪心自问：我自己是不是也陷入了这个泥坑，看到不同的意见而火冒三丈呢？经我再三检查，自己并不是这个样子。不管怎样，我相信，我这种尖刻还是善意的，是与人友善的。一个青年朋友说，这是我的文风。我认为，我的文风确有尖刻的一面；但也并不缺少温柔敦厚的一面。退一步说，讨论学术问题的文章写得生动一点，似乎也无伤大雅。我同 Bechert 教授经常通信，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我想他会理解并且谅解这一点的。

Bechert 教授和美国的爱哲顿教授，算是我的某一部分论点的反对派。我的《再论》是针对爱哲顿教授的，《三论》是针对 Bechert 教授的。是不是在世界上梵文学界中我只有反对派呢？也不是的。据我所知道的，世界上也不乏支持、鼓励我的学者。日本东京大学著名的梵文教授原实博士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他在国际梵文学者的大会上发言，对我给予鼓励。在给我的信上，也给我以赞誉。对于这些隆情厚谊，我衷心感谢。我虽然修养不够，但还没有卑下到听到批评就发火，听到赞誉就飘飘然的地步。自知之明我多少还算是有一点的。不管怎样，国内外一些同行的朋友对我的鼓励，我看作是对我的鞭策。我之所以今天在隔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又搞起佛教梵语来，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是主要原因。我希望能竭尽绵薄，再在这方面做一点工作，庶不至辜负他们的期望。

也许有人要问：费这样多的精力来研究佛教梵语，究竟有什么意义与价值，究竟有什么用处呢？这是一个颇为难以回答的问题。要想直接同四化，同两个文明的建设挂上钩，确实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把眼光放宽，也确实能找出不少的用处。过去西方学者研究比较语言学，意在找出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相互关系，发现发展的规律，蹊径独辟，成绩辉煌。但是在这个范围以外的问题，往往注

意不够,甚至不加注意。我研究佛教梵语几十年以来,不管成绩大小,环境如何,有一个指导思想始终没有放弃,这就是,除了找出语言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以外,我希望把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个想法,最初 Bechert 教授也是赞成的。他在一篇论文中讲到我那一篇论 $-am > -o, -u$ 的论文时说,这能达到“有用的目的”(useful purpose),能确定《妙法莲华经》某一个本子的产生地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但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他后来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硬说印度西北方言中没有这样的变化。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谈到了。不管怎样,我不想随着他的转变而转变。我仍然坚决维持我原来的看法。我觉得,这一条路并非独木小桥,而是阳关大道。我还要继续走下去。我只恨自己走得还不够彻底,还不够深入,还不够细致。我相信,许多印度佛教史上的问题,可以通过佛教梵语的研究而得到解决。除此以外,研究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不言而喻的。

写到这里,篇幅已经够长了,想说的话都已经说完了。我只希望,这些话能帮助读者了解我写这些论文的背景和用意,让这篇自序不至完全成为蛇足。回顾我对佛教梵语的研究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这一条研究的道路并不平坦,几经波折,屡历风雨。但是,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出于什么动机,我总算是坚持下来了。说到坚持下来所获得的成绩,我却只有脸红,然而并不气馁。虽年逾古稀,但我仍然要说一句:希望在于未来。在今后若干年的时间内,在完成其他课题的同时,我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对佛教梵语进行探讨,希望能解决一些新问题,取得一些新成果。我在上面曾谈到两次研究高潮。我相信,在今后图书资料条件日益改善的情况下,在自己研究兴趣日益浓烈的条件下,必将有一个第三次高潮出现,而且是一个高于前两次高潮的最高的高潮。

1984年3月26日

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现在印度正以极其隆重的仪式纪念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涅槃二千五百周年。我们都知道，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中起过很大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都有过影响。因此，有很多人关心这次的纪念，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下面我从佛教史里选出一个国外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多少年来争而未决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借表纪念之意。

巴利文小品 (Cullavagga) V. 33. 1 叙述了一个故事：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①

佛最后说：*anujānāmi bhikkhave sakāya niruttiyā buddhava-*
canam pariyaṇitum

① 巴利文《律藏》The Vinaya Pitakam, ed. by Hermann Oldenberg, vol. II, The Cullavagga, London 1880, P. 139.

上面这个故事牵涉到原始佛教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语言的问题。佛教在初兴起的时候，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一种革命。它坚决反对使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是非常自然的。尽管在公元前五六世纪，梵文的发展已达到最高峰，如果使用它的话，可以给宣传教义带来很多好处，然而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佛仍然丝毫不加考虑，并且骂这两个比丘是“傻瓜”。这两个比丘大概是由于出身婆罗门家庭的关系，脑筋里还有一些旧的思想意识，所以向佛建议采用梵文，因而受到了佛的呵责。

不用梵文，究竟用什么语言呢？在宗教宣传方面，“语言政策”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必须有一个决定。佛最后的一句话，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然而问题也就出在这里。这一句话本身比较含混，直译出来就是：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用自己的语言学习佛所说的话。

从汉文译文看起来，这句话也还算是清楚。但是专就巴利文原文来看，“自己的语言”(sakāya niruttiyā)这个词就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佛自己的语言”，另一种是“比丘自己的语言”。多少年来，国外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争论之点，就在这里。

英国学者 T. W. Rhys Davids 和德国学者 H. Oldenberg 把这个词解释为“比丘自己的语言”^①。德国学者 W. Geiger 把它解释为“佛自己的语言”^②。自从他们引起争端以后，国外的梵文学者和佛教研究者纷纷参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派：一派同意前者，一派同意后者，一派异军突起，另立新说。否认

① 巴利文《律藏》英译本 Vinaya Texts., III,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XX, p. 151.

② 《巴利文·文献和语言》(Pāli. Literatur und Sprache). Strassburg 1916, p. 5.

W. Geiger 的说的有德国学者 F. Weller^①、英国学者 A. B. Keith^②、德国学者 M. Winternitz^③等。

英国学者 E. J. Thomas 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他把 nirutti 解释为“文法”，把佛最后说的那一句话译为：

我允许你们，比丘呀，根据它的文法去了解佛所说的话^④。

这当然是讲不通的，因为 nirutti 决不能解释为“文法”^⑤。

W. Geiger 看起来很孤立。但是他有一个很有力量的靠山。他引用了巴利文佛典注释的权威佛音 (Buddhaghosa) 的注释作为自己的依据：

此处所谓 sakā nirutti 就是三藐三佛陀所说的摩揭陀方言^⑥。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要想说明这些问题，解决这些纠纷，必须研究一下佛在世时所说的方言和佛典编纂的过程。

我们知道，释迦牟尼生在当时印度的北部边陲地区，在现在的尼泊尔境内。但是他一生游行传教却多半是在当时的摩揭陀国 (Magadha, 约当现在的比哈尔邦)。因而他利用的语言，很可能就是摩揭陀语^⑦。从各方面来推测，他活着的时候，还不会有写定的佛典，不管用什么语言。

根据佛教的传说，他涅槃后不久，他的弟子大迦叶就在王舍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因为有五百人参加，故名“五百结集”。佛涅槃后一百年，佛教徒又在毘舍离集会。因为有七百人参加这次大会，故名“七百结集”。据早期的传说，这次集会的主要目的是

① 《佛教杂志》 Zeitschrift für Buddhismus, n. F. I, 1922, p. 211 ff..

② 《印度历史季刊》 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I, 1925, p. 501.

③ 《印度文学史》 A History of Indian Literature, II, p. 602.

④ 《佛陀传》 The Life of Buddha, New York 1927, p. 253 f..

⑤ 参阅 M. Winternitz, 《印度文学史》，II, p. 602 ff..

⑥ Samantapāsādikā ed. Sanyal u Pye IV 416¹.

⑦ H. Oldenberg, 《佛陀》 Buddha, London 1928, p. 177.

铲除教律方面的十种邪说^①。但是较后的传说则说，这次集会延续了八个月，把世尊的遗说校阅了一遍^②。这说法显然有点太过火了。但是，佛死了已经一百年，前此专恃口头流传的佛经可能有一些已经写定下来。所以这个传说里面可能包含着一些历史事实。

据学者们一般的意见，大概在第三次集结的时候，大规模地编纂大藏经才有可能^③。这时候正是佛教护法大王阿育王（即位时间约为公元前 273 年）在位的期间。高僧 Tissa Moggaliputta 在波吒利弗（Pāṭaliputra，现在的巴特那）会集众僧，来编纂佛典。我们上面已经说过，佛在世时宣扬教义所用的语言，可能是摩揭陀语。那么，在他死后，佛徒们根据口头流传下来的一些零碎经典而编纂佛典的时候，编定时所用的语言也就会是摩揭陀语。但又不会是纯粹的摩揭陀语，因为时间渐久，佛教传布的区域渐广，想保持一种纯粹的语言，是不能够想象的。所以德国学者 H. Lüders 就把这原始佛典所用的语言称为古代半摩揭陀语。Tissa Moggaliputta 属于上座部（梵文是 *sthaviravāda*，巴利文是 *theravāda*），所以他带头编纂的也就是这一派的经典。他还派遣和尚四出宣传佛教。被派到锡兰去的就是阿育王的弟弟（一说是阿育王的儿子）摩晒陀（Mahinda）^④。据锡兰佛教徒的传说，现存的巴利文大藏经就是摩晒陀带到锡兰去的，而巴利文也就是摩揭陀语（*Māgadhā nirutti, Māgadhikā bhāsā*），换一句话说，巴利文就是佛所说的话，而巴利文大藏也就是佛教的唯一正统的经典。

写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上面说过的佛音对 *sakā nirutti* 这两

① Cullavagga XX,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Vol. XX. p. 409 ff..

② 巴利文《岛纪》Dipavaṃsa, V. 27ff.; 《大纪》Mahāvamsa, IV.

③ E. J. Thomas, 《佛陀传》，p. 170 f.; Copleston, 《佛教》Buddhism, p. 154, 171, 175.

④ Barth, 《印度的宗教》Religions of India, London 1921, p. 130; Copleston, 《佛教》，p. 176 ff..

个字的解释,我们就可以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解释,是他的立场决定的。他是巴利文佛经注释的权威,他拥护巴利文经典,他当然会不遗余力地为巴利文经典争一个正统的地位。他的解释之不可靠,之主观,原因也就在这里。

我们还可以从语言特征上来阐明巴利文不是摩揭陀语。关于巴利文的流行地区问题,学者们有各种不同意见。Westergaard^①和 E. Kuhn^② 认为巴利文是优禅尼(Ujjayini)地方的方言。R. O. Franke 从碑刻方向来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结论是:巴利文是宾陀山(Vindhya)中部至西部一带的方言^③。Sten Konow 也以为宾陀山地带就是巴利文的故乡^④,因为他发现巴利文与毘舍遮语之间相同的地方很多,而毘舍遮的故乡他就定为优禅尼^⑤。H. Oldenberg 最初主张巴利文是羯陵迦(Kaliṅga)方言^⑥。附和此说者有 E. Müller^⑦。但是 H. Oldenberg 后来又放弃了前说,另立新说,说巴利文是马拉提语的前身^⑧。E. Windisch^⑨ 和 W. Geiger^⑩ 则复

① 《论印度史的最古时代》Über den ältesten Zeitraum der indischen Geschichte, p. 87.

② 《巴利文法述论》Beiträge zur Pali-Grammatik, p. 6 ff..

③ 《巴利文与梵文》Pali und Sanskrit, p. 131 ff..

④ 《毘舍遮语的故乡》The Home of Pāṣāci, ZDWG. 64, p. 95 ff.

⑤ Grierson, 《印度西北部的毘舍遮语》The Pāṣāci Languages of North-Western India, Asiatic Society Monographs. Vol. VIII, 1906. 书中说毘舍遮语是印度西北部方言。

⑥ 巴利文《律藏》, Vol. I. London 1879, p. L ff..

⑦ 《简明巴利文法》Simplified Grammar of the Pali Language, London 1884, p. 111.

⑧ 《奥义书的学说和佛教的起源》Die Lehre des Upanishaden und die Anfänge des Buddhismus, Göttingen 1915, p. 283.

⑨ 《论巴利文的语言性质》Über den sprachlichen Charakter des Pali, Actes du XIV^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Orientalistes, prem. partie, Paris 1906, p. 252 ff..

⑩ 《巴利文·文献和语言》, p. 5.

归旧说，说巴利文就是摩揭陀方言^①。

上面这些说法虽然分歧，但也有比较一致的一点，这就是，多数学者都主张巴利文是一个西部方言。事实上也正是这样子。巴利文的形态变化与阿育王石刻的吉尔那尔（Girnār）石刻相似，如“于”格的语尾是 -amhi、-e，“业”格复数的语尾是 -ne 等等。但是另一方面，摩揭陀语则是一个东部方言，r 变成 l，s 变成 ś，以 -a 作尾声的字“体”格的语尾是 -e 等等。两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无论如何也不能混为一谈。

根据上面的论证，我觉得，我们已经有把握来下一个结论了：saka nirutti 不是指“佛自己的语言”，也不是指什么“文法”，而是指“比丘们自己的语言”。佛允许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如果还有人认为这样的论证还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再举出一些新的证据。上面引的巴利文小品里的那一个故事，在中译大藏经里有不少的异本。现在条列如下：

毘尼母经卷四：

有二婆罗门比丘，一字乌嗟呵，二字散摩陀，往到佛所，白世尊言：“佛弟子中，有种种姓，种种国土人，种种郡县人，言音不同，语既不正，皆坏佛正义。唯愿世尊听我等依阐陀至（指梵文）持论，撰集佛经，次比文句，使言音辩了，义亦得显。”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意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是故名随国应作^②。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不胜枚举，请参阅：季羨林，〈使用不定过去时作为确定佛典年代和来源的标准〉*Die Verwendung des Aorists als Kriterium für Alter und Ursprung buddhistischer Texte*，德国格廷根科学院集刊，语言学历史学类，1949，p. 288, Anm. 2.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卷，第822页。

四分律卷五十二：

时有比丘字勇猛，婆罗门出家，往世尊所，头面礼足，却坐一面，白世尊言：“大德，此诸比丘众姓出家，名字亦异，破佛经义。愿世尊听我等以世间好言论（saṃskṛta，梵文）修理佛经。”佛言：“汝等癡人，此乃是毁损，以外道言论而欲杂糅佛经。”佛言：“听随国俗言音所解，诵习佛经①。”

五分律卷二十六：

有婆罗门兄弟二人，诵阐陀鞞陀（Chandas-veda）书，后于正法出家。闻诸比丘诵经不正，讥呵言：“诸大德久出家，而不知男女语、一语多语、现在过去未来语、长短音、轻重音，乃作如此诵读佛经。”比丘闻羞耻。二比丘往至佛所，具以白佛。佛言：“听随国音诵读，但不得违失佛意，不听以佛语作外道语，犯者偷兰遮。”②

十诵律卷三十八：

佛在舍卫国。有二婆罗门，一名瞿婆，二名夜婆，于佛法中笃信出家。本诵外道四围陀（Veda）书。出家已，以是音声诵佛经。时一人死，一人独在，所诵佛经，忘不通利。更求伴不得，心愁不乐，是事白佛。佛言：“从今以外书音声诵佛经者，突吉罗。”③

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卷六：

缘处同前。时尊者舍利子与二婆罗门子而为出家，一名牛授，二号牛生。二人悉教读诵经教。后时此二人共游人间，

①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卷，955页上。

②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卷，174页中。参阅“五分律”卷六（《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卷，39页下）：“时诸比丘种种国出家，诵读经偈，音句不正。诸居士便讥呵言：‘云何比丘昼夜亲承，而不知男女黄门二根人语及多少语法？’诸比丘闻，各各羞耻，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问诸比丘：‘汝等实尔不？’答言：‘实尔，世尊！’佛即遥责诸居士：汝愚痴人，如何讥呵异国诵经，音句不正！”

③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3卷，274页上。